

试论语言偏见——读 R.A. HUDSON 《社会语言学》

LINGUISTIC BIAS BASED ON SOCIOLINGUISTICS BY R.A. HUDSON

范明新¹, 吴玉凤²

Mingxin Fan¹, Nareerat Watthanawelu²

^{1,2}泰国宋卡王子大学北大年校区人文与社会学院

^{1,2}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Pattani Campus, Thailand

Received: August 8, 2020 / Revised: November 12, 2020 / Accepted: November 17, 2020

摘要

Hudson 在《社会语言学》中论述“语言与社会不平等”时谈到了“语言偏见”现象，他认为：“人们以语言形式发送社会信息的信息源叫做“语言偏见”。基于这一理论，本文试从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偏见”形成的逻辑、“语言偏见”与文化差异、“语言偏见”的特征、“语言偏见”与社会不平等及“语言偏见”的意义进行分析。通过举例分析发现“语言偏见”存在于社交实践中，是一种普遍存在却容易被忽视的社会现象。“语言偏见”能增强群体内成员的团结，但也可能引起群体间的矛盾。“偏见”不等于“歧视”，只有正视“语言偏见”存在的事实，尊重群体文化的多样性，群体间才能更和谐地相处。

关键词：语言 言语 语言偏见

Abstract

In sociolinguistics, Hudson talked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linguistic bias” when he discussed “the inequality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He believed that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that people use to communicate in language forms is called “linguistic bias”. Based on this theory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inguistic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linguistic bi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 bia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linguistic bi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 bias and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linguistic bias. Through analysis of examples, it was found that linguistic bias exists in social practice, which is a common but easily ignored social phenomenon. Linguistic bias can enhance the unity of members in a group, but it may also cause conflicts among various groups. “Bias” is not equal to “discrimination”; however, only by facing up to the fact that linguistic

bias exists and respecting the diversity of group culture, will different groups be able to benefit from more harmonious relations.

Keywords: Language, Speech, Linguistic Bias

引言

语言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和发展。人类学视野中的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失去一种语言，就失去了民族文化系统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Fu, 2002)。Marx 和 Engels (1995) 指出：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形成自身的内容，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当人们用语言交流的时候，在传递话语本身内容的同时，也对听话人发出话语之外的各种信息。说话人用语言形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听者传达他们的籍贯、地位、身份，他们所属的或期望所属的某一社会群体；听者也往往对这些话语之外的信息予以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在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Hudson (1990) 把这种以语言形式发送社会信息的信息源叫做“语言偏见” (Linguistic Bias)。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通常可以不通过谈话内容，而仅仅从说话人的语音、语调、语气、措辞、口音等，就可以推断出对方的职业、地位、籍贯、受教育程度，甚至由此决定与对方的亲疏取舍。理解“语言偏见”，需要时刻记住这里的“偏见”不全是我们生活中所理解的“偏见”，生活中的“偏见”是贬义词，带有歧视的意思，而 Hudson (1990) 的“偏见”意义，“歧视”只是作为“语言偏见”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语言判断的态度。

“语言偏见”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它存在于人类历史各阶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英国曾经播出过一个有关调查“口音对求职结果影响”的电视节目。节目中很多人接受了考试、面试，而最后结果是，如果能讲一口标准的 RP (全写为 Received Pronunciation，基于英格兰南部受教育阶层的发音)，就会比那些说话带地方口音比如说 Glasgow 或 Liverpool 的人获得一份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节目主持人的态度，在调查“种族和性别对求职结果影响”的节目中，主持人一脸严肃，语气极度关心，亦或义愤填膺。而面对“口音对求职结果影响”的调查时，主持人却语气轻松，面带微笑 (Hu, 2003)。

社会普遍认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不能容忍，而对“语言偏见”带来的“歧视”却明显地不在意。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 Hudson (1990) 的《社会语言学》，通过“举例论证”和“文献分析”的方法讨论了“语言偏见”的形成、特征和意义等内容。分析过程借用了“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如“传播理论 (SMCR 模式)”、Saussure 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和“人类学”的“族群认同”理论。

语言偏见形成的逻辑

Hudson (1990) 认为语言、言语和思维之间存在着一些接触点。从生理上来说，语言传入人的耳朵后，信息进入大脑，人开始分析这些信息，分析信息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变得较为复杂，思维的结果会通过言语反映出来。Saussure (1999) 认为言语是个人的，语言是社会的，言语只受制于个人，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是集体创造的，必然受社会制约。Hudson (1990) 则认为言语也要受到种种社会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因素因社会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语言是说话者头脑中用来组织言语的语法规则，即一种思维的深层结构。言语是交流的话语，是说话双方彼此听到的。从含义层面来说，语言和言语都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言语方面的社会制约不仅应用于言语，也应用在了普遍的社会行为上，语言和社会对言语的制约是结合在一起的。

言语和思维是相互影响的。人们通过言语进行推理。言语使得这样的推理变得或简单或复杂，它起到了一个工具的作用。例如，A 和 B 住在同一座山里，A 对 B 说：“我的房子是山里最小的一栋”，B 可以很容易就找到 A 的位置；但如果 A 对一个不住在这座山里的 C 说：“我的房子是山里最小的一栋”。听完 A 的描述，对 C 而言，要找到 A 的住房非常困难，由于 C 掌握的信息相对 B 来说少得多，成为了“语言偏见”较为劣势的一方。由此可见，“语言偏见”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

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传播学理论 (SMCR 模式) 来分析“语言偏见”形成的逻辑：此案例中信息发起者为 A (Source)，传播的信息 (Message) 为 A 描述的内容，传播的渠道 (Channel) 为声音，接受者 (Receiver) 为 B 和 C。当 B 和 C 接收到 A 传播的信号后，对 A 发出的信号进行分析，B 和 C 的背景不同，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必然不同，对同一信息“我的房子是山里最小的一栋”产生了不同的反映。

语言是一套法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活跃的思维改变语言的结构，在原有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排列组合”，通过言语表达出说话者的思维。思维是多变的，因此言语的表达也呈现出了多样性。人们的“语言偏见”来自思维，来自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思维，“语言偏见”所呈现出来的表象也就不尽相同。

语言偏见与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的语言表现形式无时不受社会要素的影响和制约。语言的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语言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本身，而是应该把语言放到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化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对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文化也自然成为“语言偏见”中使用的标准之一。例如，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既有人类共有的特点，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大相径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曾源于古代的朴素哲学思想。诸如《易经》中的灵变顺天的思想，儒家的中庸谦和的思想，道家的保守归真的思想等，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然和谐、谦敬顺畅的思想内涵。当一个美国人称赞一个女孩：“You are so beautiful”时，被称赞的若是美国女孩，她会自然且开心地说：“Thank you”。可当被称赞的是中国女孩时，她往往会表现得较为谦逊或不好意思。为了表现中国文化谦敬的美德，在对待同事或师长时，我们一般不会直呼他们的姓名，而往往习惯于在他的姓前加上他的职务或头衔，于是出现了一些不太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中式英语”，如 Teacher Wang（王老师），Zhang Sir（张警官等）。来自英语国家的人也对此类词汇的意义很是迷茫。因此，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进行交流时，“语言偏见”语言偏见”是突出的。

“语言偏见”使得不同群体对同种事物产生不同的态度。在中国人心中，“东风”象征“春天”、“温暖”，它吹绿了中华大地，使万物复苏，故有“东风报春”之说，所以中国人偏爱东风。而英国的“东风”（East Wind）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象征“寒冷”、“令人不愉快”，所以英国人讨厌“东风”。不过英国人喜欢“西风”，它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故有“西风报春”之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Shelley 就曾写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在诗的最后，一句名传千古的佳句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Oh, the west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啊，西风，假如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理解此诗时应对这地域文化差一异作注释，否则会因缺乏英国地域文化知识的一些汉语读者造成困惑或误解（Ji, 2006）。

在中国 56 个民族中，群体间的“语言偏见”也很常见。1989 年，意大利社会心理学家 Maass 在群体偏见范畴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群体间的语言偏见（Language intergroup prejudice）（Jiang & Yang, 2015）。何为群体间的“语言偏见”？简单说来就是：当描述一个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人们往往使用更为抽象的语言（比如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或者只有群体内成员才熟知的语言）；而当提起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时，人们则使用更加具体的语言（比如彝族人和苗族人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Zhao, 2012）。云南的汉族人会称呼彝族“倮倮”，“倮”云南人认为是不讲道理的意思，而称呼苗族为“老苗子”，也有类似歧视的意思，但这样的称呼只有在汉族人人群中才会存在，

当有彝族人或者苗族人在场时，汉族人往往会亲切地夸赞他们少数民族的服装好看。少数民族之间同样也有类似的“语言偏见”，一个村寨的傣族人不喜欢隔壁村寨的佤族人，当着佤族人的面傣族人用傣语嘲笑佤族人吃老鼠，而又用汉语卖东西给佤族人；反过来笔者也遇到过一个佤族人一边用汉语夸赞傣族小姑娘卖的蔬菜新鲜，一边用佤语抱怨菜价昂贵的情况。

很多汉族和彝族在打交道时，一开始就知道对方是彝族的话，潜意识里已经对交往对象贴上了“野蛮”的标签，也就是把对一个群体的偏见带到了意识当中，那么在交谈中，也是带着一种文化倾向（认为本族文化优越于其他族群），而且在文化的不断交流中，彝族也会被动地接受了汉人文化比自己优越的意识。因此，今天才发生了这么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文化汉化的现象。在田野调查中，在和彝族人交谈中总是能听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彝族……”，“你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可以看见明显的“语言偏见”现象，当然也要注意这个偏见中歧视的态度在国家的政策中得到了淡化，现在更多显示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即“我们”和“你们”的不同。

文化差异，特别是群体间的文化差异是偏见形成的重要因素。“语言偏见”强化了群体内成员的文化认同。

语言偏见的特征

1. 语言群体性

“语言是作为群体的一个成员标志。人们使用语言，为的是确认他们所属的（或者希望被人认为他们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这样别人按照自己评价该群体的标准去评价他们”（Hudson, 1990）。这里所说的群体，是指交谈双方所对应的群体。说话者好似“群体代言人”，而听者则在听与判断说话者的信息，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对方群体与自己群体的比较与判断，确定对方的身份、社会地位、性格等。

群体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它是不固定的，人们可能选择不同的群体标准。例如，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谈论文化时，那么群体选择可能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一个男教授和一个女教授谈论女权研究时，所涉及的群体就是男性群体与女性群体。群体的不确定性也就使得人们判断的标准产生多重性，那么语言偏见也会显得更加明显。比如群体 A 喝红酒，而群体 B 喝白酒，群体 A 的成员可能会认为喝红酒本质上是比那些喝白酒的人更酷，然后他们把此作为论据，证明他们比群体 B 优越。当然，群体 B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证明群体 A 不如他们酷。

如果把个人与个人之间简单的话语，如用“我是老师”这样的话来判断一个群体，则群体性不是“语言偏见”的必然条件。要强调的是“语言偏见”中对于言语的判断是产生于言语的外在形式，而非言语的内容，如 Hudson (1990) 所说的由于语音、语调、语气、措辞、口音等的不同，形成的一个判断。

2. 语言双向性

谈话总是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进行的。演讲虽然是一个人在讲，但也能形成“语言偏见”。比如通过一个英语演讲者的语音、语调和用词等方面来判断其是否留过学，从哪个国家留学归来等信息。

“语言偏见”的语言双向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言语双方是群体的代表。一个四川人和一个云南人谈话，语调上就明显地把这两个人分为不同的群体，所以两人初次交谈时内心可能存在这样的观点：我和他不一样，我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他是四川人（他是云南人）。这是群体认同的例子。群体认同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语言认同。所以更为广义地来说，只要两个人说话，就产生了相互区分的观念。例如，从说话内容来看，甲对乙说：“我们老师是不放假的”。那么隐含的群体是“教师群体”和“非教师群体”，或是一个“放假的群体”和一个“不放假的群体”。

第二个方面是言语双方的偏见是相互判断得出的。意思是甲判断乙时，乙也在判断甲。只有相互判断，才能形成对比，进而形成偏见，最后展现出了偏见后的态度和行为。例如一个公司想要招聘一名秘书，一个彝族来参加面试，当他听到面试官用普通话向他提问时，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回答了考官的问题，面试过程中双方都在彼此判断。最后由于求职者的普通话不标准，面试官拒绝了他。带来的影响是：这个彝族因此认为只有说好普通话的人才能找到秘书类工作，而这个面试官会认为彝族甚至是少数民族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语言偏见”产生于双方的互动中。

3. 语言信息性

语言的“信息性”是指人们说的话包含很多信息，“语言偏见”正好产生于语言信息上，人们根据话语的含义进行判断，也会根据听话者的经验和情感有选择性地表达信息。“语言偏见”可能会出现偏差或者错误。

要获取一个人的语言信息，通常的方法是让他对句子做出判断，但是倘若他讲一口非标准的语言，但是也熟悉标准的语言，那么这样的方法就显得没有效果，因为他的判断总是根据标准语言而不是根据他习惯的言语。例如，一个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说着一口拥有少数民族口音的汉语，当他和一个城里的汉族交谈时，城里人可能会根据经验判断他为少数民族，进而把对民族的消极看法放到此人身上。那么这位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可能把这个偏见判断成其它原因，可能认为城里人看不起他这个农村人，或是对他本人有什么意见等。一个消极的“偏见”（根据 Hudson 对偏见的概念，笔者把偏见分为积极的偏见和消极的偏见。所谓积极的偏见是指对说话对方形成好的或是中立的态度或判断的偏见，而消极的偏见是对对方形成不好的态度或判断的偏见）。就是通过误解而产生的。

“语言偏见”产生是带有选择性判断的，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由于谈话双方表达的不清楚，使客观上的信息不完整性，也可能是故意的表达不完整。最可能的原因是说话双方的经验和文化背景，直接影响着对言语的理解和判断。那么，经验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必然导致“语言偏见”的长期存在。想要消除几乎不可能，但是消极的“语言偏见”可以通过不断的文化适应得到缓解。

语言偏见与社会不平等

由于存在主观的或客观的标准，每个人都会采取一些标准来评价自己的语言。语言本身呈现出了不平等的现象。语言的不平等现象会引起一个问题：“它使人们不能注意到语言作为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潜在根源”。换句话说“语言偏见”的实质是社会的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Hudson 把这三个方面的不平等称为“三类语言的不平等”）(Hudson, 1990)。

第一方面，主观不平等。它涉及到人们对彼此语言的看法。在一些社会中，按照人说话的方式判断人的智力高低、友情深浅、以及诸如此类的品质，尽管这样一种根据言语作出的判断可能完全是错误的 (Hudson, 1990)。从 Hudson 的观点来看，主观上的不平等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但是主观上的不平等也可能来自社会中的不平等因素。例如民族偏见中对语言的偏见，一个原因是在历史长河中确实存在着民族的不平等，这种客观上的不平等导致了主观上的不平等，即出现主观上的偏见意识。并把这种偏见用于某一民族的某一显著文化标志。语言正好是这一显著标志之一。因此，虽然社会在发展，文化在变迁，文化仍然存在，文化传承也还在继续，主观上的不平等要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那么语言偏见的实质之一就展现为主观上的不平等。

第二方面，纯语言的不平等。语言不平等与纯语言不平等是不同的概念。Hudson (1990) 说：“纯语言的不平等与一个人所知道的语项有关”。根据他的解释“语项”是与语言结构理论有关，可以理解为语言的结构，包括词项和各种各样的规则。不容怀疑的是人们所知道的语项反映了他所拥有的经验。经历不同，人们所知道的语项范围就不同。这在词汇方面特别明显。比如学民族学的人，对不同文化的词语可能比一般人掌握得要多，那么在交谈中谈到的文化词可能是别人不能明白的，在这一情况下，无形中就具有了一种优势，那么偏见也就更容易产生。大人和小孩子的话语也是在纯语言上出现明显的不平等。这里的纯语言不平等的解释要立足于语言中的词汇方面。不是组成言语的规则出了问题，而是人们使用不同词汇形成了语言的偏见。那么，追溯人们对于词汇掌握的差距源头，主要还是由于社会的不平等。比如说社会教育的不平等，使得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本身就存在着语言的偏见。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大人与小孩词汇的差别虽然不是由于主观的社会不平等“主观的不平等”，笔者的意

思是这种不平等不是人们有意造成的,而是生理或其它人为无法改变的状态下的不平等)。造成的,但不平等的现象是事实。

第三方面,交际的不平等。它说的是怎样运用语项成功地进行交际的知识,而不是语项本身的知识 (Hudson, 1990)。交际不平等指的是运用言语同他人交谈时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和技能。它也包括说话人选用语言变项来显示出讨人喜欢的方式上的不平等。这似乎带有一种情景性,即以上所提到的人们选择不同的思维来表现语言。但思维是主观的,而谈话时所选择的知识和技能差别却是客观存在的。这与人们如何获得不同词汇有相同的原由。一个留过学的和一个没有留过学的人,依然在说话的方式上会有一些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如英国,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穿衣打扮和言谈举止上,大概判断出此人是平民还是贵族。说话是有规则的,这种规则最终演变成一种知识或习惯,指导着在这一阶层上的人。因此,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阶级性,这是由于社会不平等造成的,表现出来的就是在交际上的不平等。

语言偏见之意义

探讨语言意义,这是一个哲学意义中的问题。当我们阐明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时,我们要明白关于这个语言表达式说了什么 (Alston, 1988)。最后,要说明的不是某句话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要探讨“语言偏见”的表象。

“语言偏见”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讲某种语言的人群已经“掌握”了统治讲其他语言人群的大权。而这种语言的地位仅仅反映其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通常,统治阶层和上层社会群体使用“标准”或“正式”语言,反之,下层社会群体使用“非标准”或“非正式”语言。不同社会群体人们的不同语言特点给听者传递了判断他们社会背景的信息。人们使用语言,以便使他们在一个多维的社会空间中有一个位置。从说话人的角度出发,这是一个传递有关他自己信息的方式——说明他是哪一类人(或希望被看作是哪一类人)和他的社会地位。同样的,听话的人也从他的话语中得出有关他的结论:他的性格特点以及其他方面的品质。

其次,语言偏见成为人们群体意识强化的因素。没有语言的偏见,群体差异就无法得到显现。人们根据说话人来判断此人是否和“我们”是同一类,以达到判断我们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的利益。这一判断的好处无需阐释,功能都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在交谈中往往都是存在着语言偏见的”,虽然这一说法有些夸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们总是在说话中比较,只要有比较,无论是个人的比较还是群体的比较,都会起到一个差异性得到突显的效果。那么作为以群体为特征的“语言偏见”,便能促进群体强化意识的功能。

最后,语言偏见展现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上面已论述人们的思维决定了人们如何表达,也提到人们怎样用自己的知识技能来进行交流,而且人们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说话者

的言语进行判断，所有的这些都呈现出了一个多样性的特征。归根到底，“语言偏见”表现出来的就是人类的智慧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结语

“语言偏见”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被大多数人忽视的社会现象。提到“偏见”，大多数人可能和笔者一样，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结果和现象。笔者通过 Hudson 的《社会语言学》，对于“语言偏见”有了新的认识：偏见是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之一，也是跨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问题 (Xiong, 2011)。“语言偏见”可能产生如语言歧视一样的负面影响，但也可能形成强化群体意识的功能。意识到“语言偏见”的存在，我们可以在民族冲突等问题中多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方向；在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多一份尊重和谅解；“语言偏见”在群体之间普遍存在，它能成为群体内成员意识强化的因素，也可能成为群体与群体之间分歧的导火线，群体之间应该正视“语言偏见”，利用“语言偏见”加强内部团结，群体外则选择尊重彼此多样的文化。

References

- Alston, W. P. (1988).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De Saussure, F. Translated by Gao Mingkai. (1999). *General Linguistics Cour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Fu, X. (2002). Language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Academic Forum*, 6, 112-115. [in Chinese]
- Hu, G. (2003). Viewing Linguistic Bias from Social Cognition. *Journal of Chongqing Petroleum College*, 3, 21-23. [in Chinese]
- Hudson, R. A. (1990). *Sociolinguistic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in Chinese]
- Ji, C. (2006).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Management Theory and Education Research, 2, 452-453. [in Chinese]
- Jiang, Y., & Yang, H. (2015). Intentions Behind Language: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2142-2152. [in Chinese]
- Marx, K., & Engels, F. (1995).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1)*.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Xiong, W. (2011). A Study of Discourse Bia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Theory Monthly*, 9, 76-80. [in Chinese]
- Zhao, X. (2012). Language Prejudice Between Groups. Philosophy and Humanities. *Journal of Theory Monthly*, 3, 84-87. [in Chinese]



Name and Surname: Mingxin Fan

Highest Education: Master Degree

Affiliation: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Pattani Campus

Field of Expertise: Ethnology



Name and Surname: Nareerat Watthanawelu

Highest Education: Doctoral Degree

Affiliation: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Pattani Campus

Field of Expertis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